

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的起源与分布

陈甚安¹ 唐威洋² 梁永平¹ 何万顺^{3,1}

¹台湾政治大学, 台北

²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巴黎

³东海大学, 台中


摘要

分类词(个体量词)常见于东亚与东南亚语言,但在北亚至东欧地区的阿尔泰语言中常被忽视。本文检视 65 个阿尔泰语言,发现有 15 个是分类词语言,但其分类词多半不发达且是选择性使用,因而推测其分类词并非原生系统。依据“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欧亚地区仅汉语之分类词为原生系统,本文推测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是与邻近的汉语或波斯语接触产生的。本文首先确认这 15 个语言的分类词符合严谨的定义,接着检视各语言中分类词的语意与语音,判断是否具有汉语或波斯语分类词的特征。最后综合各语言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归纳出以维吾尔语为界,以东之阿尔泰分类词语言受汉语影响,以西则受波斯语影响,维吾尔语则同时受两者影响。假设波斯语的分类词亦间接受汉语影响,则汉语为欧亚语言分类词单一起源的假设亦适用于阿尔泰语言。

关键词

分类词 量词 阿尔泰语言 语言接触 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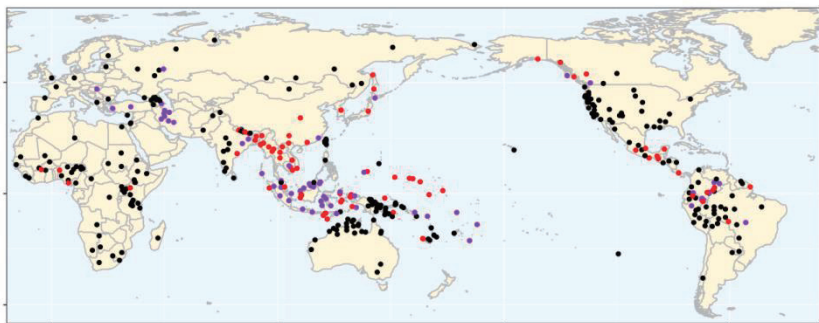
致谢 本文以第一作者之硕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精进而成。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数轮的审查中提供了诸多甚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作者深表敬意与谢意。本文之研究获得以下两项台湾科技事务主管部门研究计划之支持: 108-2410-H-029-062-MY3、106-2410-H-029-077-MY3,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何万顺 (One-Soon Her; 通讯作者) [onesoon@gmail.com]; 东海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台中, 台湾 407224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407224);  <http://orcid.org/0000-0002-8255-8061>

1. 绪论

分类词在东亚及东南亚语言中是非常普遍的词类，在句法结构中 与数词及名词连用，且在语意上须与名词有关连。汉语是极为典型的 分类词语言，有非常丰富的分类词系统；如分类词“朵”就必须接 花类的名词，而“顶”则必须和帽子类的名词并用，因此可以是“三 朵玫瑰”“三顶钢盔”，但不会是“三朵钢盔”或“三顶玫瑰”。分 类词在文献中有许多名称，如类别词、单位词或个体量词等等，本文 一律以“分类词”称之。

对于分类词语言在全世界的分布，Gil (2013) 调查了 400 种语言， 其中 140 种语言有分类词。图 1 中标记黑点的语言不含分类词；紫点 的语言有分类词，但并非强制使用；红点的语言则具有强制性的分类 词。亚洲地区语言的分类词系统最丰富，且大部分具有强制性，而美 洲与非洲沿海只存在少数的分类词语言，澳洲则没有。



● 有分類詞(強制性) ● 有分類詞(選擇性) ● 沒有分類詞

图 1 世界分类词语言分布 (Gil 2013)

除了 Gil (2013) 的研究之外，Her and Li (to appear) 依照语言的分布密度和地理关系，将分类词语言分布最密集的汉语族 (Sinitic)、苗瑶语系 (Miao-Yao)、南亚语系 (Austroasiatic)、壮侗语系 (Tai-Kadai)、藏缅语族 (Tibeto-Burman)、印度-雅利安语支 (Indo-Aryan) 汇整并做出“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该文透过语言及地理分析，推断这六支语系的分类词皆来自单一语言，透过接触邻近语言向外扩散，使其他语言也产生分类词。过往的学者因分类词语言在壮侗语系以及汉语族最为密集且丰富，而分为主张起源为“汉语”和“壮侗语系”两派。Her and Li (to appear) 认为关键线索是早在公元前 16 世纪，商朝甲骨文中就已记载少量的分类词；到了公元 220 年的

魏晋南北朝，分类词的功能已非常广泛且分工精细(Bu 2011)。相较于汉语，壮侗语系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在公元 1300 年，甚至比分类词已发展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晚了一千年，这是“分类词汉语起源”的一大优势。Her and Li (to appear) 进而提出分类词之“单一起源假设”，主张欧亚地区语言中分类词之产生均直接或间接受汉语影响¹。

除上述语言区域外，也有其他语言受汉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日语及韩语的分类词皆是受汉语影响而来。日语方面，可透过例句 *usi san-tou* “牛三头”发现日语受汉语的影响，除借用汉语词汇“头”为分类词外，日语数词系统从“三”开始就借用汉语数词系统计算数量，原生数词残存至“二”以下，其余已极少用。韩语则只借用汉语分类词的概念，仍使用韩语固有词作分类词。但无论是借用概念或词汇，皆可看出日语和韩语与汉语接触后留下的痕迹(Janhunen 2000)。根据韩语和日语的例子可知，地理环境靠近汉语区域，或历史文化上曾与汉语交流密切的语言，很有可能产生分类词。

另外较不受重视的是，从中国东北到东欧的阿尔泰语言²中，也存在少数的分类词语言，但其分类词数量远不如汉语，且大多是选择性使用(Chen 2015)。这些现象显示阿尔泰语言的分类词应非原生系统，而是受到其他语言影响才产生。本文的主旨是从既有文献发掘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语言，其地理环境及语料特性，并推测其分类词可能的来源。

本文架构如下：在第二节首先定义分类词；第三节介绍 14 种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之地理分布，并依地理位置初步推测其分类词之可能来源；第四节将分类词依其起源分类，并验证是否符合第三节的语言地理分布，同时验证单一起源理论的正确性；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2. 定义分类词

本研究的主旨是推测阿尔泰语言分类词的来源，故如何定义分类词至关重要。过往许多研究对分类词未有一致的定义，又因分类词与量词在句法结构上占相同位置而将两者归为一类，许多文献用“量词”统一称呼两者。Greenberg ([1972] 1990: 172) 从数学的角度对分类词的定義做出相当精简的解释：分类词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乘 1”。在此基础上，Her (2012) 将分类词(Classifier) 和量词(Measure word) 视为乘法算式中的被乘数，数词为乘数。举例来说，“三条鱼”、“三只鱼”与“三尾鱼”乘法上皆是“ $[3 \times 1]$ 鱼”的概念，翻译成英文皆是“three fish”，即使删除分类词“条”“只”和“尾”的“乘 1”也不会数量上有任何改变，这也说明为何分类词在语意上是可省略的。

然而，在“三斤鱼”“三箱鱼”和“三堆鱼”中，量词“斤”“箱”和“堆”在数学上的值都不是 1，但也同样是乘数“三”的被乘数。藉由乘法的概念可以清楚得知，分类词与量词同为被乘数，在句法为同一词类，但在语意上形成两个次类，分类词的值必然是 1，而量词的值则不必然为 1。

以撒拉语为例，林连云(Lin 1985)将句(1)中的“bun”(本)和“goş”(双)皆统称为“量词”；但以上述的乘法定义判断，“bun”为“乘 1”，是分类词；“goş”为“乘 2”，是量词。因此，(1a)中的“bun”出现与否并不影响语意，但若将(1b)中的“goş”删除，则无法得到“双”的数学意义。

(1) 撒拉语(Lin 1985: 54)

a. bər bun şu	b. bər goş goz
一 本 书	一 双 眼睛
‘一本书’	‘一双眼睛’

因此，将“bun”和“goş”视为同一词类是正确的，但藉由乘法定义可进而判断出仅有“bun”为分类词。本文将依此标准判断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

3. 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虽然“阿尔泰”应视为“语系”或“语区”尚有争议，但并不影响本文论述。本文采用 *Ethnologue* 所纪录的 65 种阿尔泰语言，其中有 41 种突厥语(Turkic languages)、13 种蒙古语(Mongolic languages)和 11 种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 languages)；由于日语及韩语是否属阿尔泰语言尚有争议，且如前所述，两者的分类词都已确定是从汉语借用词汇或概念产生，并无讨论需要，因此并无纳入本文讨论范围。如图 2 所示，阿尔泰语区涵盖北亚、中亚和东欧等地区。本文从文献整理所发现的分类词语言有 15 个，详见附录。其中突厥语有 9 个：鞑靼语(Tatar)、土耳其语(Turkish)、克里米亚鞑靼语(Crimean Tatar)、阿塞拜疆语(Azerbaijani)³、撒拉语(Salar)、西部裕固语(West Yugur)、维吾尔语(Uyghur)、哈萨克语(Kazakh)及乌兹别克语(Uzbek)；蒙古语中有 3 个：达斡尔语(Daur)、土族语(Monguor)和东乡语(Santa)；满-通古斯语有 3 个：满语(Manchu)、鄂温克语(Evenki)及锡伯语(Xibe)。



图2 阿尔泰语言分布图

除具有复杂分类词系统的汉语，现今伊朗使用的现代波斯语（亦称伊朗语）中也存在许多分类词（Mahootian 1997）。相较于汉语，波斯语的分类词数量虽不丰富，但已是目前该区域能找到分类词系统最丰富的语言。截至目前为止，除伊朗本土的波斯语外，周边地区尚未发现比波斯语还要发达的分类词语言。又因波斯语地理位置离汉语使用区域较远，大致排除语言接触的可能；关于波斯语分类词的来源，仅知部分是从阿拉伯语的名词借用而来（Stilo 2018），尚未有非常明确的源头。本文从地缘因素猜测波斯语为另一个阿尔泰语言分类词来源。本节主要以 15 个分类词语言的地理位置，辅以语言接触的历史数据，推测这些语言的分类词来源。

3.1 突厥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以下介绍突厥语族中 9 个分类词语言的地理位置：鞑靼语（Tatar）、土耳其语（Turkish）、克里米亚鞑靼语（Crimean Tatar）、阿塞拜疆语（Azerbaijani）、撒拉语（Salar）、西部裕固语（West Yugur）、维吾尔语（Uyghur）、哈萨克语（Kazakh）及乌兹别克语（Uzbek）。

鞑靼语又称塔塔尔语，为鞑靼人的主要语言。近代鞑靼人大部分居住在东欧及俄罗斯，只有约五千人在 20 世纪中叶迁至中国境内，仅占鞑靼人口的 1%（Schwarz 1984）。因年代尚近，中国的鞑靼语与东欧的鞑靼语并无太大差异。按地理位置判断，鞑靼语和汉语地区距离遥远，故将其分类词可能来源归于波斯语。从历史角度来看，鞑靼的历史最早记载于唐朝，属于突厥统治下的部落；但蒙古西征时，“鞑靼”被欧洲人与中亚人用来称呼蒙古人（Chen 1986）。现代鞑靼人之先祖为属突厥民族，居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加尔人（Volga

Bulghars)。9至11世纪，伊斯兰化的波斯文化透过贸易往中亚传递，影响当时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使布加尔人于10至11世纪皈依伊斯兰教(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这个过程很可能将波斯语分类词带入这些民族的语言中。13世纪蒙古人消灭布加尔部落联盟，建立钦察汗国，当地人便接受统治者的“鞑靼”称号作为本民族的名称(Chen 1986)。15世纪中叶，钦察汗国逐渐瓦解，鞑靼人建立了喀山汗国(Khanate of Kazan)；古鞑靼语(Old Tatar)于此时形成，并在16世纪俄国并吞喀山汗国后成为官方与俄国境内外突厥人沟通的语言(Chen 1986; Burbiel 2018)。古鞑靼语于19世纪的中亚影响力甚大，鞑靼人透过该语言向中亚传播伊斯兰教，同时也藉该语言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交流(Csató and Johanson 2015)。从古鞑靼语的书面语数据来看，该语言保留了浓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色彩(Burbiel 2018)，可能对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产生了不小影响，包括巩固分类词的使用。随着历史演进，古鞑靼语与周边蒙古语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后，逐渐演变成今日的鞑靼语(Chen 1986)。这些历史资料也能支持鞑靼语分类词来自波斯语的假设。

土耳其语起源于中亚，是突厥语族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现今约8000万人使用，通行于土耳其及其周边国家。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形成源于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该政权的主体民族是前述于9至11世纪接受波斯-伊斯兰文化的中亚突厥人，他们在公元1071年击败拜占庭帝国后占领了现今土耳其的领土主体——小亚细亚半岛(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让中亚突厥部落及其波斯化的语言文化得以进入该地区。土耳其语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公元1200年，地理位置与波斯语地区极为接近，且语言中有许多从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用的词汇，很可能从塞尔柱帝国时期便存在，因此可合理推测土耳其语的分类词是受波斯语影响。又因相对于其他接近欧洲的阿尔泰语言，更接近波斯语区，因此相较于更北方的其他突厥语言，土耳其语产生分类词的可能性较高。

克里米亚鞑靼语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因名称相似，克里米亚鞑靼语常被误会是鞑靼语的方言，但其所属之钦察语支与鞑靼语所属之西突厥语支为不同分支(Mansur 2018)，不能互相沟通。克里米亚鞑靼语为阿尔泰语言分布最西北方的语言，与汉语区距离太远，其分类词相当可能是受波斯语的影响。且在钦察汗国瓦解，克里米亚汗国独立后不久便成为鄂图曼土耳其的附庸国(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又在18世纪被俄罗斯并吞(Liu 2014)，因此克里米亚鞑靼语应受到土

土耳其语的前身——鄂图曼土耳其语和古鞑靼语的影响，更加提高其分类词间接来自波斯语的可能性。

阿塞拜疆语普遍使用于阿塞拜疆和伊朗，位于欧亚交界，邻近伊朗、哈萨克、土耳其等国。历史上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渊源极深，曾借用这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发音，直到 9 世纪才有文字纪录 (Cornell 2011)。该语言也深受土耳其语影响，书面阿塞拜疆语和鄂图曼土耳其语密不可分，古土耳其语的文本常可透过古阿塞拜疆语解读；现代阿塞拜疆语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Baku) 方言为基础，该方言也受现代土耳其语强烈的影响 (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因此阿塞拜疆语的语法特征与土耳其语有相似之处 (Kornfilt and Heusinger 2009)。地理位置极靠近波斯语区，历史文化也受其影响，因此初步判定为受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撒拉语为撒拉人的主要语言，分布于中国西北，在今日的青海省以及甘肃省等地。关于撒拉族的族源，主流理论认为其先民于元代从中亚迁至中国 (Ma 2008)，因此撒拉语现今还是保有許多突厥语词汇，与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等同宗相同 (Göksel and Kerslake 2000)。不过相较于其他突厥语言，其地理位置与汉语区十分接近，也和汉藏民族有频繁接触，四周邻近不少分类词语言，如土族语和西部裕固语，因此可判断撒拉语的分类词是从汉语大量借用；也因过度汉化，使现今撒拉语已被中国官方列为濒临消亡的语言 (Ma 2009)。综合以上原因，初步将其归类在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

西部裕固语为中国甘肃省等地裕固族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已逐渐减少；相较于同是裕固族常用语言的东部裕固语，虽然地理环境相近，但属于蒙古语族，两者之间无法沟通。裕固族是回鹘人的后裔：建于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于 9 世纪灭亡后 (Yang 2015)，其中一支回鹘人南迁至甘肃，和蒙、藏等民族融合形成裕固族 (Chen and Lei 1985)。裕固族是本文中唯一一个未经波斯-伊斯兰文化大规模影响的突厥语族群，至今主要宗教信仰仍是佛教与萨满信仰，而非伊斯兰教 (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西部裕固语也因此保留了较多古代突厥语的特征，其汉语借词数量远超波斯语与阿拉伯语 (Chen and Lei 1985)。从地理和历史角度来看，西部裕固语分类词受汉语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维吾尔语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广泛，位于波斯语区和汉语区之间。语言结构与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相似。维吾尔族和裕固族同样来自回鹘人；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的回鹘人分为三支：迁往中亚者建立了喀喇汗国 (Karakhanid Khanate)；迁往新疆吐鲁番盆地者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Idikut)，此为维吾尔族的先祖；迁往甘

肃者则形成裕固族(Yang 2015)。10世纪中叶,喀喇汗国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并以今日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噶尔(Kashgar)为中心将波斯-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13至14世纪,维吾尔语的喀什噶尔方言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新疆南部)的共通语,这样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Engesæth, Yakup, and Dwyer 2009)。由于新疆地区历史上不同政权的递嬗与影响,维吾尔语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曾与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借用词汇(Zhao 1985)。虽在历史上常受汉文化影响,但本文初步认为其距离过远,各朝代强盛度也会影响其版图是否涵盖维吾尔语区域,且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以地理因素较难判断的情况下,从文化宗教因素初步推测为受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哈萨克语主要用于哈萨克境内及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波斯语和汉语皆有接触,但透过14世纪之哈萨克语文献得知,当时已经受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影响而借用词汇;到了18、19世纪,又从属突厥语族的鞑靼和察合台(Chagatai)书面语引进不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与汉语的接触则较晚,是在近代才借用词汇(Geng and Li 1985)。无论从地缘关系或文化历史影响的顺序来看,皆偏向波斯语区。

乌兹别克语主要用于乌兹别克及中国部分地区,有南北两个分支。其地理位置极靠近伊朗,历史上也与波斯语有深厚关系:乌兹别克人的先祖之一是钦察汗国治下的一个突厥部落联盟——乌兹别克联盟;在钦察汗国瓦解后,其中一部分移至现今乌兹别克地区,征服了当地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的语言与波斯语的塔吉克方言(Tajik)有紧密关系,该语言成为乌兹别克语的主要组成部分(Csató and Johanson 2015)。相对地,乌兹别克语直到近代才与汉语和其他语言接触(Cheng and Abudurehman 1987)。虽然乌兹别克语与汉语和波斯语皆有接触,但无论是从影响的深度、时间顺序或地理位置来看,都能合理推测乌兹别克语是受到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3.2 蒙古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蒙古语族中有三个语言使用分类词:达斡尔语(Daur)、土族语(Monguor)和东乡语(Santa)。达斡尔语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黑龙江省等地,由达斡尔族使用。达斡尔族是建立辽国之契丹人的后裔,自4世纪中叶起从今日中国东北的辽河辗转移至内蒙古、蒙古国东北部,乃至黑龙江以北等地。17世纪时因俄罗斯势力东移,清朝政府将黑龙江以北的人民迁至南岸,达斡尔族便于现居地生活至今。因地域关系,达斡尔语长期与满语和鄂温克语等满-通古斯语言交流频繁,从这些语

言吸收不少词汇；自清末以来又与汉民族杂居，产生许多汉语借词 (Uzhuer 2004)。不论是满语、鄂温克语或汉语皆是分类词语言，因此在地域上达斡尔语可能受汉语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分类词。

土族语使用于青海省土族自治区，与同语族之达斡尔语、保安语、东乡语等有极相似的词汇和句法。土族的前身是从中国东部迁至青海-甘肃一带，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族群，在藏文文献中已有记载 (Chinggeltai 1988)，后来又与元代蒙古移民融合形成 (Chinggeltai 1988; Slater 2003)。土族发展历史悠久，土族语与周边的藏语和汉语交流甚密，吸收大量汉语词汇，数词系统也逐渐汉化 (Janhunen 2000)。土族人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文化与汉语区域交流相对频繁 (Zhaonasitu 1981)，地理位置也相当接近汉语地区，因此归类为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东乡语是东乡族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少部分在 20 世纪后半叶由中国政府迁至甘肃省其他地区与新疆，但仍保持其语言与宗教。东乡族的历史不甚明朗，其口传历史指出他们的祖先在 13 至 14 世纪由中亚迁至现居地；学界主要的推测则是该族是由中亚商人、元朝蒙古士兵与汉人混合形成，这个交流的过程导致这些族群的伊斯兰化及其语言的蒙古化，但具体的发生时间尚待考据 (Janhunen 2003)。由于其地理分布接近汉语区，族源也包含汉族，因此将其初步归为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3.3 满-通古斯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满-通古斯语族中有三个语言使用分类词：满语 (Manchu)、鄂温克语 (Evenki) 及锡伯语 (Xibe)。满语现存于中国东北，靠近中俄边界，多用于黑龙江省等地 (Wang 2005)。满语分类词无论是从地理或文化历史的角度，皆可推测其来源是汉语。在 12 世纪初，满族的祖先，女真部落建立的金朝从东北往南侵略北宋，造成北宋灭亡，随后女真民族与中国北方的汉人接触频繁 (Chen 2014)。北宋虽灭亡，但汉文化相对强势，很有可能使女真语大量从汉语借用词汇。现今也可观察到女真文字字型和汉字极为相似。满人身为女真族后裔，满语自然也继承了女真语融合汉语的特色。满人所建立之清朝，更在中国境内统治长约三百年，其语言文化与汉民族已有非常紧密的融合 (Liu, Zhao, and Zhao 1997)，故将满语初步归类在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鄂温克语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及俄罗斯，为鄂温克族主要沟通语言。鄂温克族原本生活在黑龙江中游；17 世纪中叶后，由于俄罗斯势力的扩张，部分鄂温克族人南迁至黑龙江北部的大兴安岭、嫩江一

带；公元 1732 年，清政府将千余名鄂温克族军人及其家属迁至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驻防，这是鄂温克族于中国境内的分布西界 (Hu 1986)。因语言接触的关系，鄂温克语参杂许多满语、蒙古语、汉语的借词 (Atknine 1997)。地理位置在已知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中位于最北之处，因此可预测其受汉语的影响相较于满语及其他较为南方的语言会更小，分类词也很可能不是来自汉语的直接影响，而是由受汉语影响的满语再间接影响鄂温克语，分类词的数量也因与汉语距离遥远而不丰富。因此，鄂温克语的分类词初步归类在受汉语影响之下。

锡伯语现今分布于两地，主要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以及中国西北的新疆 (Li and Zhong 1986)。同一语言族群会分隔如此遥远是出于历史原因。锡伯族本居于今日中国吉林省所在地区，在清帝国康熙皇帝时期就被多次以军事目的征调至现在的内蒙古东北部、辽宁省等地 (Wu and Zhao 1984)；公元 1764 年，乾隆皇帝又以增防边境为由，调派锡伯族军队前往新疆定居，利于巩固边疆 (Han 1994)；因这种历史原因使锡伯人在新疆群聚，造就这种特殊现象。虽然早期分隔两地的锡伯语尚可沟通无碍，随着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锡伯人与汉民族逐渐融合，锡伯语在东北地区逐渐消亡，反倒在新疆生活的锡伯人保留着旧有的锡伯语。有鉴于锡伯族本出自中国东北，相较于鄂温克族靠近南方，分类词应是直接透过汉语或满语影响而来；且考虑到满清对锡伯族的统治时间较长，控制程度也大于分布范围至俄罗斯的鄂温克族，本文推测是受满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

4. 研究发现之讨论

从语料分析 (细节探讨请见“辅助材料”之档案：<https://jcl.fah.um.edu.mo/wp-content/uploads/2024/03/chen-et-al-suppl-31.pdf>)，在 15 种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中，共有 8 种判定是受汉语影响，有 6 种是受波斯语影响，而维吾尔语则可能受到汉语及波斯语的影响。这些语言的分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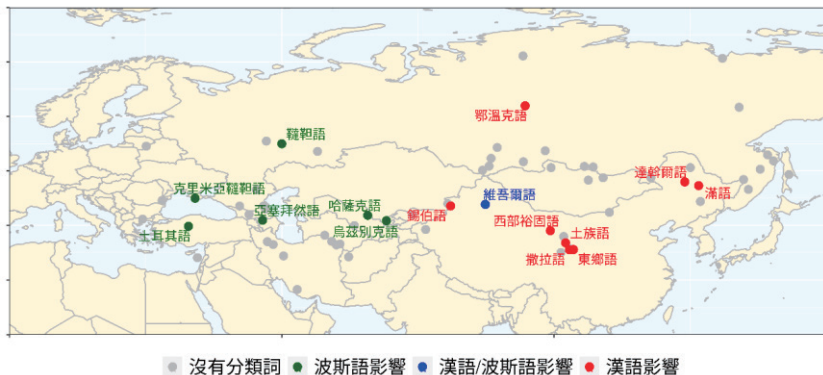


图3 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语言分布图

受汉语影响的8种分类词语言是：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满语、鄂温克语和锡伯语。除锡伯语因历史原因迁至远离汉语区的新疆外，其余语言符合第三节地理分布的预测，皆分布在图3的右侧。这8种语言的分类词多半可从发音寻找来源。相较于受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汉语影响范围涵盖三种不同的语族，其分类词种类相对丰富且差异性大，也借用汉语的排列结构。这和受波斯语影响的语言不同。

在9个突厥分类词语言中，只有邻近汉语的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判断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借用的词汇有概念性也有全面性的例子，涉及自然界的词汇皆使用自身分类词，人工产物的词汇皆使用汉语分类词。其中撒拉语更借用汉语的[数词+分类词/量词+名词]排列方式。纵观整个突厥语族，可观察到某些语言的分类词虽是受波斯语影响产生，语言中却充斥汉语量词，显示虽然汉语离这些语言距离相对遥远，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这点也可看出汉语的强势度大于波斯语。

蒙古语族中土族语、达斡尔语和东乡语皆是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土族语除分类词发音和汉语完全相同外，也借用汉语的数词系统，固有数词逐渐消亡，以及使用汉语[数词+分类词/量词+名词]的排列方式。达斡尔语因靠近中国东北，故同时受汉语和满语两大强势语言的影响，使语言中的量词及分类词都比土族语丰富许多，语言当中也存在以叠加分类词表达“每个”的语意，这种在汉语与满语中常出现的分类词应用方式。东乡语绝大多数的分类词都来自汉语，其中有部分是借汉语名词作分类词用，功能相较于接近原名词的汉语分类词也有所变化，这种对借词的活用显示分类词已深入其语法系统中。

总体来说,虽然蒙古语族 14 个语言中仅有 3 个存在分类词,比例略低于其他两个语族,但无论从分类词还是数词系统乃至词汇排列的结构,都可看出汉语对其影响是非常全面的。

而在这 8 种语言当中,分类词发展最为茁壮的是满语,可看出其分类词已逐渐内化,使用固有词替代从汉语借用的分类词,进而产生独有的分类词系统,除了少数量词“dzaŋ”(丈)“sun”(吋)“gin”(斤)发音与汉语相似,大部分量词及分类词皆已内化,不同于撒拉语或西部裕固语可从分类词的语音观察端倪并找到影响源头,相较之下明显看得出发展深度的差异。

随着满语的分类词系统及民族势力逐渐强大,满语周边与汉语无法直接接触的语言,如锡伯语和鄂温克语,也因满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使两者成为间接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

受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有 6 种:鞑靼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皆属突厥语族且皆分布于图 3 左侧,符合第三节地理分布的预测。其中与波斯语分类词最相似且出现频率最高的分类词是“dane”和“næfær”。透过这 6 种语言可知,波斯语的分类词系统虽与汉语一样是主要的影响源头,但波斯语分类词相较于汉语显得薄弱许多,使波斯语周边因其影响而产生的分类词系统都不发达,不如满语强大到可作为一个间接传递的源头。

虽然波斯语与汉语都是分类词的主要源头,但波斯语分类词在使用上是选择性的,因此也应非原生系统;再者,其出现频率极高的分类词“næfær”是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Stilo 2018),但现今阿拉伯语并无分类词,显示波斯语的分类词起源尚有疑问。

在第三节中我们从地理位置判断分类词语言的来源,其中有一个较难判断的语言,即维吾尔语。因其所在位置介于汉语区和波斯语区间,故必须从分类词推敲来源;而我们观察到维吾尔语除了典型的波斯语分类词“næfær”和“dane”外,还有一个用于计算名词“门”的分类词“qanat”,本意为“翅膀”,此分类词在波斯语当中并不存在,反而与汉语的分类词“扇”语意相似。单一语言同时受到两个语言影响而产生分类词的现象虽没有在其他语言出现,也需要更多语料考证,但本文考虑地理分布的独特性,将其视为同时受波斯语和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⁴。

在第一节提到,某语言对其他语言分类词的借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用分类词的概念及词汇,属于较彻底的借用,如撒拉语借用汉语的“封”和“本”。另外一种借用方式为概念性的借用,文

献中称为 stimulus diffusion (Kroeber 1940), 是只借用分类词概念并使用自己语言的固有词扮演分类词的角色, 如满语借用汉语分类词“本”的概念, 使用语意为“册”的名词“debtelin”转变成分类词; 这种概念性的借用必须了解分类词本身的语意和用法才能确认。在藏缅语族的分类词发展中, 概念性的借用也是屡见不鲜 (Weidert 1984; Kiryu 2009: 66)。本文中有些语言的少部份分类词无法以语音判断来源, 且文献并无提供其语意, 如撒拉语的分类词“gudu”, 不如“dʒoŋ”“fun”容易判断, 故我们将这类分类词皆视为概念性的借用。

而在突厥语族中, 无论是受汉语还是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皆有两个重复度极高的分类词, 即在表 1 和表 2 的两个分类词, 分别为“baʃ”, 其语意是“头”, 用于计算牲畜数量, 和“dyp”, 语意为“根”或“地面”, 用于计算植物, 两者是在古突厥语中就已存在的词汇, 可以理解这些分类词出现频率极高的原因与古代突厥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 皆是与大自然相关的词。不过, 这些语言虽有共同词汇, 但却受到不同的分类词语言影响; 但特别的是, 它们却巧合的使用相同词汇作分类词, 且都具有相同功能。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本文提出两种假设。

表 1 突厥语分类词“头”

阿塞拜疆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鞑靼语	哈萨克语
baş	baʃ	baş	baʃ	bas
克里米亚鞑靼语	土耳其语	乌兹别克语	维吾尔语	
baʃ	baş	baʃ	baʃ	

表 2 突厥语分类词“棵”

阿塞拜疆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鞑靼语	哈萨克语
	dyp	dəp	typ	typ
克里米亚鞑靼语	土耳其语	乌兹别克语	维吾尔语	
typ		tüb	typ	

4.1 假设(一): 波斯语中恰好有和汉语相同概念的词源

Moinfar (1980, 引自 Lehmann 2015) 所整理出来的波斯语分类词当中 (详见“辅助材料”之表 1), 计算动物的分类词“raʔs”, 本身的语意也是“头”, 恰好与汉语的分类词概念相同, 所以有可能是汉语和波斯语都使用相同分类词概念计算动物的情况, 让受影响的语言也使用同一个名词“baʃ”作分类词。然而这种假设似乎不适用于“typ”, 因波斯语中可计算植物的分类词有三个: “ta”、“dane”和“ʕadad”, 其语意皆和“typ”的语意“根”和“地面”无关, 反

而是汉语计算植物的分类词“根”或“棵”和“ty”的语意较贴近，故用第一个假设解释这种现象显得有些差强人意。

4.2 假设(二)：古突厥语族中已有分类词

对这种现象的第二种假设是，早在古代突厥民族尚在其起源地，未分散至诸多地区时，就已有分类词的概念。按照 Brunn, Toops, Gilbreath(2012)所述，突厥人起源于 3、4 世纪并开始发展成规模强大的部落，在 5 世纪时势力范围已扩及中国和现今乌兹别克等地区，不时会与汉民族产生冲突；6 世纪时版图持续向东扩张，成为中亚地区最强盛的游牧民族，并掌握着丝路；直至 7 世纪，由于唐朝对突厥发动一系列的战争造成突厥民族势力逐渐式微，汉民族重新控制丝路，使突厥民族被迫离开居住地向四周分散，部分突厥民族南迁被汉人同化，其余部落则陆续在往后几百年间西迁至西亚和东欧等地，请见图 4。这是历史上称为“突厥迁徙”的大规模迁移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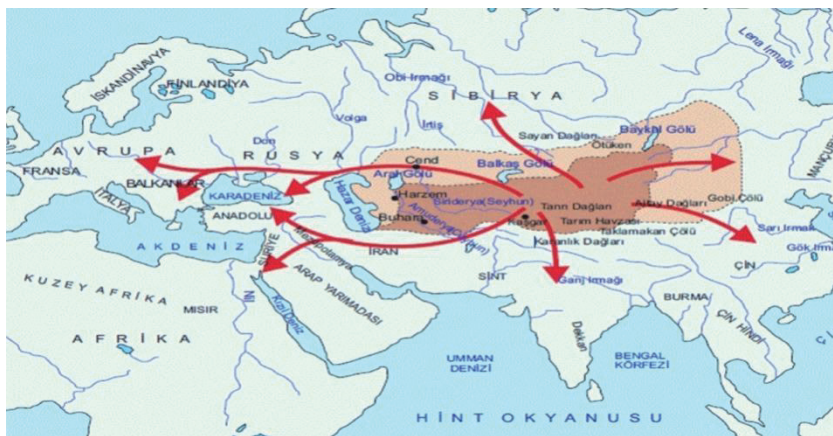


图 4 突厥西迁路线(Batu and Batu 2018)

因此可以推测，突厥民族在尚未西迁时就与汉民族有频繁的交流。当时已是魏晋南北朝后的年代，据步连增(Bu 2011)所述，魏晋南北朝的分类词已发展成熟，有可能突厥语言的分类词与分类词相对成熟的汉语接触后萌芽，之后部分因战争而迁徙的突厥民族向西扩散时，又因伊斯兰教的强盛而吸收波斯语的分类词，第二度受到分类词影响，造成突厥语言的分类词看似受不同源头影响而产生，却拥有一致分类词的情况。因此古突厥语的分类词很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

综上所述，似乎有历史事件佐证的第二个假设较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也有待更多文献考证。若此假设成立，就间接证明这 15 个阿尔泰分类词语言皆是受汉语影响，也为 Her and Li (to appear) 提出汉语为源头之“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添加几分证据。

然而波斯语本身的分类词起源似乎较无迹可寻。分类词在波斯语不如汉语有强制性，某些波斯语文法书籍甚至没有提及分类词。Stilo (2018) 和 Lehmann (2015) 针对伊朗的分类词有详细的叙述，但也表明在原始的印欧语系语言中并不存在分类词，其来源似乎没有太多线索可以着墨。在此或可大胆假设：考虑到波斯语东北的中亚地区及西北方的东欧，皆是波斯语分类词传递方向，可以先排除，剩下波斯语以西的阿拉伯半岛和东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次大陆，较有可能是分类词传入的来源。

Stilo (2018) 虽指出最为常见的分类词“nafar”是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似乎从阿拉伯语借用分类词是相当合理的推测；但本文认为从阿拉伯借用的仅是词汇本身，而非分类词的概念。因从 Gil (2013) 的分类词地图可知，阿拉伯语和周边语言都不存在分类词，如要往西南方的非洲延伸的话，必须至中非地区才存在某些分类词语言，故波斯语分类词是由西方的阿拉伯传递而来的猜测似乎过为牵强。在排除阿拉伯半岛为可能的影响源后，仅剩伊朗东南方的印度地区和巴基斯坦可能为波斯语分类词的源头。在 Her and Li (to appear) 的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中，印度亚利安语支中共有已知 21 种分类词语言，推测分类词也是受到汉语单一起源影响层层传递而来。这些语言中有部分靠近巴基斯坦南方，相较于阿拉伯语地区，地缘关系较近，故波斯语分类词有较高机会是透过印度亚利安语支的语言传递影响而来。虽然此假设看似符合地理特征，也是波斯语分类词最有可能的来源，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语言是否存在分类词，仍需更多相关语料考证。

5. 结论

本文探讨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的起源与分布。首先耙梳文献探寻看似分类词的现象；为避免名称和定义不同造成混淆，本文依据 Her (2012) 的乘法概念定义真正的分类词，并综合阿尔泰分类词多为选择性的特性，和 Her and Li (to appear) 对于汉语周边语言的分类词皆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看法，推测阿尔泰语言中 15 个分类词语言皆是受邻近分类词语言之影响，并将汉语和波斯语这两个邻近且有相对丰富分类词的语言假设为影响的源头。

根据各语言的语料, 本文通过比较分类词的发音及概念来推测其来源。初步结果显示, 15 种分类词语言皆与其邻近的源头相似, 符合地理分布; 阿尔泰语言也存在像日语中借用汉语数词系统的情形, 且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发现分类词具有二度传递现象, 被影响的分类词语言一旦有足够的发展, 还会再度传递至周边语言。

本文在突厥语族中发现, 无论是受汉语或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 皆存在用法及发音相同的分类词“*baġ*”和“*typ*”。加入历史因素进行第二次分析后, 推测突厥语族在尚未西迁时, 就已经受汉语影响产生分类词, 西迁后再从波斯语受到二度影响, 使突厥语族的语言中, 虽各自有波斯语和汉语分类词的显著特征, 但也具有共同分类词。这个结果也与 Her and Li (to appear) 的汉语为欧亚语言分类词单一起源的假设不谋而合。此外, 波斯语本身的分类词也应是受其他语言影响而来, 依据地理环境初步推测是从其东南方的印度亚利安语支传递而来。然而, 本文对阿尔泰语言和波斯语的分类词起源虽做出初步的观察, 但因涉及范围广泛, 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都需考虑, 故需更多研究以验证假设的真实性。

附录
(APPENDIX)

阿尔泰语言列表(不含日本-琉球语系、韩语语系、艾努语)
分类词语言以**粗体底线**标示

突厥语族(41)	蒙古语族(13)	通古斯语族(11)
North Azerbaijani 阿塞拜疆语	Daur 达斡尔语	Manchu 满语
Crimean Tatar 克里米亚鞑靼语	Tu 土族语	Evenki 鄂温克语
Northern Uzbek 乌兹别克语	Dongxiang 东乡语	Xibe 锡伯语
Salar 撒拉语	Bonan	Even
Tatar 鞑靼语	Kangjia	Nanai
Turkish 土耳其语	East Yugur	Negidal
West Yugur 西部裕固语	China Buriat	Oroch
Uyghur 维吾尔语	Mongolia Buriat	Orok
Kazakh 哈萨克语	Russia Buriat	Udihe
Ainu	Halh Mongolia	Ulch
Balkan Gagauz Turkish	Peripheral Mongolia	Oroqen
Karachay-Balkar	Kalmyk-Oirat	

阿尔泰语言列表(续表)

突厥语族(41)	蒙古语族(13)	通古斯语族(11)
Bashkort	Mogholi	
Chagatai		
Chulym		
Chuvash		
Dolgan		
Gagauz		
Ili Turki		
Karagas		
Karaim		
Karakalpak		
Kashkay		
Khakas		
Khorasani Turkish		
Krimchak		
Kumyk		
Kyrgyz		
Nogai		
Northern Altai		
Salchuq		
Shor		
South Azerbaijani		
Southern Altai		
Southern Uzbek		
Khalaj		
Turkmen		
Tuvan		
Urum		
Yakut		
Siberian Tatar		

注释
(NOTES)

1. 本文中“语言 A 的分类词起源于语言 B”这类表述是指语言 A 的分类词词类并非原生，而是从语言 B 直接或间接借用而来。该借用包含三种可能：一是语言 A 将语言 B 的某个分类词完全借去，包含其语音和语意；二是语言 A 只借语言 B 的某个分类词之语意，利用自身表达该语意之固有词作为分类词；三是语言 A 只借用语言 B 的分类词词类之功能，根据自身需求创造语音和语意都与语言 B 的分类词没有对应关系的固有分类词。这三种情况并不互斥，可能同时发生于一个语言的分类词借用上，共同形成该语言的分类词词类。

2. 阿尔泰语系的假说存有争议，但无论将“阿尔泰”视为“language family”（语系）或“Sprachbund or linguistic area”（语区），对本文论述并无影响。

3. 在台湾所使用的名称是“亚塞拜然”。

4. 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在地理上较接近汉语区的蒙古语族语言，如保安语(Bonan)、康家语(Kangjia)，以及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语(Even)、赫哲语(Nanai)、涅吉达尔语(Negidal)等没有受汉语影响产生分类词，但离汉语区甚远的维吾尔语却有来自汉语的分类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汉语对维吾尔语分类词的影响或可追溯至回鹘汗国时期(744–840)(Yang 2015)。如 3.1 节所述，维吾尔人的先祖是于蒙古高原建立回鹘汗国的回鹘人，而回鹘汗国因曾帮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得到唐朝给予的贸易特权，故与唐朝维持友好紧密的关系(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在回鹘汗国灭亡，维吾尔族于新疆地区形成后，其与汉人的交流依然持续，因此维吾尔语所继承的与汉语交流之历史是从八世纪持续至今的漫长时间；且在这段历史的初期，回鹘人是比今天的维吾尔族在地理上更接近汉语区的。

反之，保安语、康家语等位于青海-甘肃地区的蒙古语族语言都是由蒙古帝国通行的中古蒙古语(Middle Mongolian)衍生而来(Janhunen 2003; Lefort 2017)，可见这些民族是元朝时由强势的蒙古族与当地入融合而成，蒙古语此时为强势语言，待元朝灭亡后，汉语的影响优势才浮现，因此这些语言与汉语的交流史远比维吾尔语短，故其中有些语言没有来自汉语的分类词是十分合理的。

最后，满-通古斯语族中的鄂温语、涅吉达尔语分布于西伯利亚东部，赫哲语则横跨西伯利亚及中国黑龙江省北部(Tsumagari 1997)，这些地区的农业条件不佳，也不若甘肃、青海、新疆地区是中国和中

亚地区文明互动的必经之处，汉人在历史上并无诱因与当地民族大规模、常态性接触；清朝对其境内赫哲族的控制力似乎比对鄂温克族更弱，一直到光绪皇帝时期才将整个赫哲族纳入官僚系统的统治，且基层官员仍由本族人担任(E 2018)。因此，这些语言可能并没有与汉语及满语充分接触，因而没有借用分类词。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TKNINE, Victor. 1997. The Evenki language from the Yenisei to Sakhalin. In *Northern Minority Languages: Problems of Survival*, edited by Hiroshi Shoji and Juha Janhunen, 109–12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BATU, Ali, and Heysem Batu. 2018.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urkish gastronomy from ancient times until today. *Journal of Ethnic Foods* 5(2): 76–82.
- BRUNN, Stanley D., Stanley Toops, and Richard Gilbreath. 2012. *The Routledge Atlas of Central Eurasian Affairs*. New York: Routledge.
- BU, Lianzeng 步连增. 2011. Hanyu mingliangci qiyuan zaitan 汉语名量词起源再探 (Th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revisited).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89–96.
- BURBIEL, Gustav. 2018. *Tatar Grammar*. Stockholm/Moscow: Institute for Bible Translation.
- CHEN, Chao-Yang 陈昭扬. 2014. Lüelun Jinchao tongzhide yingxiang jiqi lishi diwei 略论金朝统治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Jin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status). *History Education* 20: 141–178.
- CHEN, Xinyi 陈新义. 2015. *Zhongguo beifang Aertaiyuyan yuxu leixing yanjiu* 中国北方阿尔泰语言语序类型研究 (A study of the word order typology of Altaic languages in Northern China).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CHEN, Zongzhen 陈宗振. 1986. *Tataeryu jianzhi* 塔塔尔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ata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EN, Zongzhen 陈宗振, and Yuanchun Lei 雷远春. 1985. *Xibuyuguyu jianzhi* 西部裕固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West Yugu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ENG, Shiliang 程适良, and Abudureheman 阿不都热合曼. 1987. *Wuzibiekeyu jianzhi* 乌孜别克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Uzbek).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INGGELTAI 清格尔泰. 1988. *Tuzuyu he Mengguyu* 土族语和蒙古语 (Monguor and Mongolian).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 CORNELL, Svante E. 2011. *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 CSATÓ, Éva Á, and Lars Johanson. 2015.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E, Shanjun 鄂善军. 2018. Jianlun Hezhezu de lishi yu zuyuan 简论赫哲族的历史与族源 (On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the Nanai people). *Jiamusi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1): 161–163.
- ENGESÆTH, Tarjei, Mahire Yakup, and Arienne Dwyer. 2009. *Greetings from the Teklimakan: A Handbook of Modern Uyghur*. Volume 1.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larworks.
- GENG, Shimin 耿世民, and Zengxiang Li 李增祥. 1985. *Hasakeyu jianzhi* 哈萨克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Kazakh).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GIL, David.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ited by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Chapter 55.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55>, Accessed on 2019-11-20.
- GÖKSEL, Aslı, and Celia Kerslake. 2000. *Studies on Turkish and Turkic Langua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GREENBERG, Joseph. [1972]1990. 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ited by K. Denning and S. Kemm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6–193. [First published 1972 in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 1–39. Stanford, C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 HAN, Qikun 韩启昆. 1994. Xibozu xiqian shubian luxian tujie 锡伯族西

- 迁戍边路线图解 (Illustrations of Xibe people's migration routes to the western frontier). *Manzu yanjiu* 满族研究 2: 90–94.
- HER, One-Soon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1668–1691.
- HER, One-Soon, and Bing-Tsiung Li. To appear.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Pacific: A hypothesis. In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c Tang and Marcin Kilarsk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 Zengyi 胡增益. 1986. *Ewenkeyu jianzhi* 鄂温克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Evenk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JANHUNEN, Juha. 2000. Grammatical gender from east to west. In *Gender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Part II: Manifestations of Gender*, edited by Barbara Unterbeck, Matti Rissanen, Terttu Nevalainen, and Mirja Saari, 689–797.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KIRYU, Kazuyuki. 2009. On the rise of the classifier system in Newar. In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75), edited by Yasuhiko Nagano, 51–69.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KORNFILT, Jaklin, and Klaus von Heusinger. 2009. Specificity and partitivity in some Altaic langua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Workshop on Formal Altaic Linguistics*, edited by R Shibagaki and R Vermeulen, 19–40. Cambridge: MIT Press.
- KROEBER, Alfred L. 1940.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1): 1–20.
- LEFORT, Julie. 2017.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The emerging category of classifier.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6: 174–193.
- LEHMANN, Christian. 201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3rd edition.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LI, Shulan 李树兰, and Qian Zhong 仲谦. 1986. *Xiboyu jianzhi* 锡伯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Xibe).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LIN, Lianyun 林连云. 1985. *Salayu jianzhi* 撒拉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Sala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LIU, Jingxian 刘景宪, Eping Zhao 赵阿平, and Jinchun Zhao 赵金纯. 1997. *Manyu yanjiu tonglun* 满语研究通论 (A general study of Manchu).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chaoxian minzu chubanshe.
- LIU, Xianzhong 刘显忠. 2014. Kelimiya bandao de lishi bianqian 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 (The history of Crimean Peninsula). *Dangdai shijie shehuizhuyi wenti*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 95–100.
- MA, Wei 马伟. 2008. Saluer wangchao yu salazu Salazu 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 (The Salur Dynasty and the Salars).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19: 96–106.
- . 2009. Yuyan jiechu yu Salayu de bianhua 语言接触与撒拉语的变化 (Contact induced changes of the Salar language).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shehuikexue ban*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35(3): 29–35.
- MAHOOTIAN, Shahrzad. 1997. *Persian Descriptive Grammars*. London: Routledge.
- MANSUR, Salih. 2018. *Crimean Tatar Langua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 MOINFAR, Moh. Djafar. 1980. Les classificateurs en persan (Classifiers in Persian). In *Wege zur Universalienforschung: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 zum 60. Geburtstag von Hansjakob Seiler* (Paths to research into universals: Linguistic an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to Hansjakob Seiler's 60th birthday), edited by Gunter Brettschneider and Christian Lehmann, 317–320. Tübingen: G. Narr.
- SCHWARZ, Henry G. 1984. *The Minorities of Northern China: A Survey*.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London: Routledge.
- STILO, Don. 2018.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s in the Araxes-Iran linguistic area. In *The Diachron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s*, edited by William B McGregor and Søren Wichmann, 135–1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SUMAGARI, Toshiro. 1997.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national borders of Tungusic.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4: 175–186.
- UZHUER, Ounan 欧南·乌珠尔. 2004. *Dawoeryu gailun* 达斡尔语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aur). Heilongjiang: Haerbin chubanshe.
- WANG, Qingfeng 王庆丰. 2005. *Manyu yanjiu* 满语研究 (A study of Manch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WEIDERT, Alfonso. 1984. Th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of Newari and its historical Southeast Asian background. *Kailash: A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11(3-4): 185-210.
- WU, Yuanfeng 吴元丰, and Zhiqiang Zhao 赵志强. 1984. Heilongjiang diqu Xibozu de lishi bianqian 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 (The history of Sibe people in Amur area). *Beifang wenwu* 北方文物 3: 4-8.
- YANG, Fuxue 杨富学. 2015. “Yuguxue” ying qingqi hexi Huihu yanjiu de daqi “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 (The Yugur study should raise the banner of the study on Hexi Uyghur). *Hexi xueyuan xuebao* 河西学院学报 31: 1-7.
- ZHAONASITU 照那斯图. 1981. *Tuzuyu jianzhi* 土族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Monguo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ZHAO, Xiangru 赵相如. 1985. *Weiwueryu jianzhi* 维吾尔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Uyghu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30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23日】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ORIGIN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ALTAIC LANGUAGES**Shen-An Chen¹ Marc Allasonière-Tang²****Yung-Ping Liang¹ One-Soon Her^{3,1}**¹*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²*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³*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 feature of sortal classifiers, comm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s also found in 15 of the 65 Altaic languages we have examined, though the classifiers are far fewer and used optionally.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the Altaic classifier systems are not indigenous. Based on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that Chinese is the only language with an indigenous classifier system in Eurasia, we propose that the rise of classifiers in Altaic i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classifier languages. Having first confirmed that the putative classifiers in these 15 languages are genuine classifiers, we then examine the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fiers identified in each language and detect the influence from either Chinese or Persian. Taking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e suggest that classifier languages east of Uyghur we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while those to the west are influenced by Persian; Uyghur itself was influenced by both. Assuming that Persian classifiers are not indigenous ei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is applicable to classifier languages in Altaic.

KEYWORDS

Sortal classifier Mensural classifier Altaic languages Language contact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